

学校编号: 10384

分类号\_\_\_\_\_密级\_\_\_\_\_

学 号: 200201030

UDC\_\_\_\_\_

厦 门 大 学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南唐党争与士人心态论略  
附论徐铉入宋前的诗歌创作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mong parties in  
the Dynasty of South Tang and The mentality of scholars

杨 娟 娟

指导教师姓名: 吴在庆 教 授

专 业 名 称: 中国古代文学

论文提交时间: 2005 年 6 月

论文答辩时间: 2005 年 6 月

学位授予日期: 2005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_\_\_\_\_

评 阅 人: \_\_\_\_\_

2005 年 6 月

##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兹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的其它个人或集体的研究成果，均在文中以明确方式标明。本人依法享有和承担由此论文而产生的权利和责任。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 内 容 提 要

南唐只存在三十九年，但党争却持续了十余年。当时稍有声望的文臣几乎都被涉及，历经了宦海的沉浮。南唐也因朋党之争而由强变衰，到后主李煜之时，只能靠纳贡称臣勉强维持生计。因此南唐党争就成为后代学者研究南唐史，探讨当时文人生活不可避免的课题。关于南唐党争产生的原因，前人普遍认为南北士人的文化矛盾是南唐党争的主要原因。笔者认为，除此以外，南唐文人较为优越的社会地位以及由此所产生的人格心态的变化也是南唐党争产生的重要原因。

本文第一章对南唐党争的始末进行较为全面的梳理；第二章论述南唐党争与南唐文人优越的社会地位和由此所产生的人格心态的变化的相互关系。由于南唐文人在生活上养尊处优，在政治、军事与外交上被赋予了巨大的权利，而元宗李璟又缺乏驾驭臣下的能力，才使得南唐文士有了更多的机会忘情干预朝政，党同伐异，从而酿成了党锢之祸；五代作家的人格心态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化而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当时文人生活条件最为优越、创作成果最为丰富的南唐，体现得尤其明显。正是这种文人心态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南唐党争的产生与延续。南唐文人的心态大体分为三种。其中，追名逐利的处世心态与意气用事、相互诋毁的仕宦心态与党争有极大关联，而沉迷声色、逃避现实的人生取向则体现了南唐党争对于文士心态转变的影响。第三章以南唐著名的文士徐铉入宋前的诗歌创作为例，来论述南唐党争对士人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南唐党争；士人心态；徐铉；入宋前；诗歌创作

## Abstract

Although the Dynasty of South Tang lasted only for about 40 year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mong parties in the ruling class persisted for more than 10 years during this period. Most of the scholars worked for the government got involved in the struggle and experienced ups and downs. During the ruling period of Emperor Li Yu, the empire became so weak as a result of such struggle that it could only survive by paying tribute to and relying on other stronger power. No wonder the struggle among parties became an issue that cannot be ignored when it comes to the study about the history of South Tang and life of scholars at that time. As to the reason that accounts for such struggle, pervious scholars generally considered it to b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south and the north. In the author's opinion, besides that, there is another important reason, that is, the scholars from the south enjoyed a superior social status and thus they experienced a change in their mentality.

In the first chapter, the author presented an overall picture of the struggle among parties during the Dynasty of South Tang.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author interpreted the interrelated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ggle among parties and the superior social status of scholars during that period and the change of their mentality in accordance. In the third chapter, the author used the poems composed by Xu Xuan, one of the famous scholars of South Tang, before the transference to Song Dynasty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influence of party struggle towards literature.

**Key word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mong parties; the mentality of governmental officials; Xu Xuan; before the transference to Song Dynasty; poetry composition

## 目 录

第一章 南唐党争始末.....	1
第二章 南唐文人心态.....	11
第一节 南唐文人优越的社会地位.....	11
第二节 文人心态的转变.....	17
第三章 徐铉入宋前的诗歌创作.....	28
参考文献.....	40
后记.....	42

## Catalogue

<b>Chapter One: An overall picture of the struggle among parties in the ruling class in the Dynasty of South Tang</b> .....	1
<b>Chapter Two: The mentality of scholars in the Dynasty of South Tang</b> .....	11
Part One: The superior social status of scholars in the Dynasty of South Tang.....	11
Part Two: The change of mentality of scholars in the Dynasty of South Tang.....	17
<b>Chapter Three: Poetry composition of Xu Xuan before the transference to Song Dynasty</b> .....	28
<b>Reference</b> .....	40
<b>Postscript</b> .....	42

## 第一章 南唐党争始末

关于南唐党争的记载，当以马令最为明确。其《南唐书》卷二十《党与传》云：“南唐之士，亦各有党，智者观之，君子、小人见矣。或曰，宋齐丘、陈觉、李征古、冯延巳、延鲁、魏岑、查文徽为一党，孙晟、常梦锡、萧俨、韩熙载、江文蔚、钟谟、李德明为一党。而或列为党与，或各叙于传者，何哉？盖世衰道丧，小人阿附以消君子，而君子、小人反类不合。故自小人观之，因谓之党与，而君子未尝有党也。”<sup>[1] (P5387)</sup>马令第一次明确地描述了南唐文人党争的状况，并表达了自己的有关态度与立场，这为后代学者研究这场党争提供了条件和基本立足点。

南唐党争主要发生在中主李璟一朝，但实际上早在烈祖李昇时期，这场党争的序幕就已悄然扯开。按照马令的看法，党争当自宋党开始，我们就以宋齐丘为出发点，梳理一下南唐党争的脉络。

宋齐丘，豫章人。初投靠升州刺史李昇，成为李昇的重要谋士，屡屡在关键时刻帮助李昇，史载“从镇京口，入定朱瑾之难。常参秘划。因说烈祖讲典礼、明赏罚，礼贤能，宽征赋，多见听用。烈祖为筑小亭池中，以桥度，至则撤之，独与齐丘议事，率至夜分。又为高堂，不设屏障，中置灰炉，而不设火，两人终日拥炉，画灰为字，旋即平之。人以比刘穆之之佐宋高祖”。

<sup>[2] (P5494)</sup>宋齐丘为李昇代吴建唐立下了汗马功劳，深得信任，作为谋臣，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可是，宋齐丘是个权势欲望极强的人物，他的政治目的远不只如此，他希望能在更大程度上左右南唐政局。但是宋齐丘也明白，李昇并不是自己能操纵的人，于是，他将目光转向李昇的后人，“时烈祖权位日隆，中外皆知有禅代之势。而烈祖恭谨守道，惧群下不协，欲待嗣君。齐丘亦盛赞其说，与烈祖意合。烈祖次子景迁，吴主之婿也，美姿仪，风度和雅，

烈祖钟爱特甚。齐丘使陈觉为景迁教授，以贾其声价。齐丘参决时政，多为不法，辄归过于元宗，而盛称景迁之美，几有夺嫡之计。所以然者，以吴主少而烈祖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国，授于景迁，景迁易制，己为元老，威权无上矣，此其日夕之谋也。烈祖觉之，乃召齐丘如金陵，以为己副，遥兼节度使，无所关预，从容而已。”<sup>[1] (P5388)</sup>由此可见，宋齐丘早就打好了自己的如意算盘，为此他不惜孤注一掷。当李德诚等人持禅诏领百官诣金陵劝进之时，“齐丘独称疾卧家，不署表。”<sup>[3] (P3698)</sup>然而宋齐丘的举动并没有阻止南唐建立的历史必然，他反而因此得罪李昇，在李昇犒赏功臣之时，宋齐丘最为失意，“明年，烈祖即位，徐玠为使相，张居咏、张延翰、李建勋皆平章事，周宗为枢密使，齐丘但迁司徒而已。自悼失计，复耻无功。不胜其忿。受宣之日，闻制，辞云：‘布衣时，陛下乃一刺史尔，今日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而出，阖门请罪。烈祖但逊辞以喻之，不为改官。”<sup>[3] (P5389)</sup>此次失败不仅没有使宋齐丘的政治热情有所减退，反而坚定了他扶植党羽，扩充实力以自固的政治意图。他一方面不断向李昇索要实权，另一方面“悉取朝廷附己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吏，皆用所亲吏视事。”<sup>[1] (P5389)</sup>那些急于功名的后进之士也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纷纷纠集在宋齐丘周围，从而初步形成党争的重要一极。《江表志》云：“陈觉、李征吉少日，依托镇南楚公宋齐丘。”<sup>[4] (P5085)</sup>《资治通鉴》卷二八三也记载：“驾部郎中冯延巳，为齐王元帅府掌书记，性倾巧，与宋齐丘及宣徽副使陈觉相结；同府在己上者，延巳稍以计逐之。……又有魏岑者，亦在齐王府。给事中常梦锡屡言陈觉、冯延巳、魏岑皆佞邪小人，不宜侍东宫；司门郎中判大理寺萧俨表称陈觉奸回乱政；唐主颇感悟。”<sup>[5] (P787)</sup>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宋齐丘一党在李昇执政时期就已初步形成，他们试图左右朝政的作法引起孙晟、常梦锡、萧俨等人的强烈不满，并“因群起反对宋党人物而形成了政治上的联合与扭结”，<sup>[6] (P68)</sup>于是党争的序幕随之开启，并随着李昇辞世、李璟继位而渐入高潮。

升元七年（943）二月，李昇刚一辞世，南唐两党围绕继承权问题就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如前文所述，宋齐丘早早地就已将其夺权的希望寄托在李景迁身上，可惜李景迁不幸早亡，于是他便转而支持李昇第三子李景遂与李璟展开王位之争，这从以下的记载中就可见端倪，《十国春秋》卷十六《元宗本纪》云：“（升元）七年二月，烈祖晏驾，秘不发丧，而下制命王监国，大赦，颁赆有差。丙子，始宣遗诏。……保大元年春三月己卯朔，烈祖殂已旬日，王犹未嗣位，方泣让诸弟。奉化节度使周宗偕侍中徐玠至柩前，手取袞冕衣王曰：‘大行皇帝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节，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秋七月，徙燕王景遂为齐王，鄂王景达为燕王，仍命景遂为诸道兵马元帅、太尉、中书令，居东宫，景达为副元帅。诏示中外以兄弟传国之意，景遂固让，不许。给事中萧俨上疏曰：‘夏、商之后，父子相传，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后昆。’疏奏，不报。以元子南昌王弘冀为江都尹、东都留守。”<sup>[3] (P3622)</sup>李璟在北来元老旧臣的支持下，才坐上了天子的宝座。宋齐丘的企图虽然又一次落空，但是他的实力却未受打击，反而因李璟所做的让步而得到了巩固。李景遂当了“太弟”，对李璟的威胁依旧存在。宋齐丘做了太保兼中书令，陈觉、查文徽为枢密副使，冯延巳为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宋党势力可谓极于一时，他们的气焰也变得越来越嚣张。“烈祖殂，元宗即位，延巳喜形于色，未听政，屡入白事，一日数见。元宗不悦，曰：‘书记自有常职，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与宋齐丘更相推唱。拜谏议大夫、翰林学士。复与其弟延鲁交结魏岑、陈觉、查文徽，侵损时政，时人谓之‘五鬼’。”<sup>[1] (P5394)</sup>一旦大权在握，宋齐丘一党便肆无忌惮地干预起朝政来。

他们首先将目光瞄准了周宗。李璟即位后不久，徐玠就病死了，周宗便成为北来元老旧臣的代表人物，自然也就成为宋齐丘等人的眼中钉。“时宋齐丘、周宗为左右丞相，齐丘专政，而宗纯谨自守。……齐丘党与隆炽，造

作飞语，以诬宗。宗泣而上诉，帝知之，弗问。”<sup>[1] (P5269)</sup>李璟刚刚当上皇帝，根基未稳，对宋齐丘等人只好退让，很快周宗便被罢相，出为镇南军节度使。而李璟也通过此事看清了宋齐丘的为人，随后抓住机会将其赶出朝廷，“既而陈觉被疏，乃出齐丘为镇海节度使。齐丘忿恚，表乞归九华旧隐，唐主知其诈，一表，即从之，赐书曰：‘今日之行，昔时相许。朕实知公，故不夺公志。’仍赐号九华先生，封青阳公，食一县租税。”<sup>[5] (P792)</sup>宋齐丘没有料到李璟会有此举，只好无可奈何地归隐九华山。但是，宋党的其它人物并没有因此罢手，他们甚至将目光瞄准了最高皇权。《资治通鉴》卷二八三记载：后晋开运元年（南唐保大二年，944年）正月，“唐主决欲传位于齐、燕二王，翰林学士冯延巳等因之欲绝中外以擅权。辛巳，敕：‘齐王景遂参决庶政，百官惟枢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余非召对不得见。’国人大骇。给事中萧俨上疏极论，不报。侍卫都虞侯贾崇扣合求见，曰：‘臣事陛下三十年，观其延接疏远，孜孜不怠，下情犹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顿与群臣谢绝？臣老矣，不复得奉颜色。’因涕泗呜咽。唐王感悟，遽收前敕。”<sup>[3] (P794)</sup>冯延巳等人隔绝中外的作法无异于谋权篡位，自然遭到了大臣们的普遍反对，在压力之下，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这一事件也使李璟看到了朝中绝大多数官员特别是都城禁军首领对皇权的支持，行事、讲话多了几分底气与自主性，南唐政坛因此过了一段短暂的宁静生活。

经过这次夺权的失败，宋党之人改变了先前赤裸裸的方式，转而寻求新的出路。他们抓住李璟新皇登基，急于建功以证明自己治国实力的心态，大肆推行拓边计划，主张攻取邻邦，扩展领土。其实，宋齐丘等人早在李昇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这一计划了，无奈没有得到李昇的支持，据《钓矶立谈》记载：

唐祚中兴，大臣议广土宇，往往皆以为当自潭、越始。烈祖不以为  
是，一旦，召宋齐丘、冯延巳等数人俱入，元宗侍侧。上曰：“天下之

势，低昂如权衡。要当以河山为腹背，腹背奠，然后手足有所运。朕藉杨、徐遗业，拥有东夏。地势未便，犹如绘事，窘于边幅，虽有手笔，无所纵放。……”冯延巳越次而对曰：‘……陛下抚封境之内，恭己静默，所以自守者足矣。如将有所志，必从跬步始。今王潮余孽，负固闽徼，并蛙跳梁，人不堪命。钱塘君臣，孱弩不能自立，而又刮地重敛，下户毙踣。荆楚之君，国小而夸。以法论之，皆将肇乱。故其壤接地连，风马相及，臣愚以为兴王之功，当先事于三国。”上曰：“不然。……徒得尺寸地，而享天下之恶名，我不愿也。孰若悉舆税之入，君臣共为节俭，惟是不腆之圭币，以奉四邻之欢，结之以盟诅，要之以神明，四对之外，俾人自守。是我之存三国，乃外以为蔽障者也。……有如天启其意，而中原忽有变故，朕将投袂而起，为天下倡。倘得遂北平潜窃，宁又旧都，然后拱揖以招诸国，意虽折简可致也，亦何以兵为哉”。<sup>[7]</sup> (P5010)

李昇认为吴越、闽与楚三国实力虽不如南唐，但若加以攻伐，旷日持久的战争一定会使南唐的国力受到巨大的损耗，如有敌国乘虚而入，后果不堪设想。反之，若与三国保持较好的睦邻关系，不仅可以保国安民，稳固社稷，而且一旦“中原忽有变故”，南唐便可打着其唐王室后裔的正统旗号号召南方各国挥师北上，共同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应该说，李昇的设想不失为比较精明的打算。任爽先生在其《南唐史》中对李昇的这一国策进行了较为透辟的分析：“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发展很快，水平已经超过北方，但是，南方的优势，是一种整体优势。在小国分立的状态之下，其优势得不到集中的发挥。与统一的中原地区相抗衡，实际上仍然处于劣势。……在这种形势下，南唐固然可以逐一吞并邻邦，首先统一南方，然后再图北举。但是，完成这一行动需要一个过程，把南方分散的实力集中

起来，在南方各区域之间矛盾重重的情况下，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奏效。只有首先控制中原，才是最便捷的途径。退一步说，只求保据一隅之地，为子孙计，则攻取南方邻国，不过‘徒得尺寸地’而已，并无太大的意义。”<sup>[8] (P170-171)</sup>李昇从一位寄人篱下的孤儿成长为一名皇帝，其间经历太多的艰辛，但也铸就他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力与掌控力。临终时他特别嘱托李璟：“汝守成业，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又啮其指至出血，预言：“他日北方当有事，勿忘吾言。”<sup>[7] (P5012)</sup>历史证明，李昇的设想是准确的。后晋末年，契丹大举入侵中原，一番烧杀劫掠之后，掳走晋出帝扬长而去。这是北方兵力最为空虚但是人心最为鼎沸的时期，南唐如果在此时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正义的出师借口乘虚而入，也许就可以实现其一统中原的目标。正如韩熙载上疏所言：“陛下恢复祖业，今也其时，若虏主北归，中原有主，则未易图也。”<sup>[3] (P824)</sup>但无奈此刻，南唐恰好深陷伐闽泥潭中，无暇顾及，“帝（按元宗）叹曰：‘闽役惫矣，其能抗衡中原乎？’”，<sup>[1] (P5273)</sup>言语中透露了太多的无可奈何。

当宋党之人最早提出拓边计划，锐于攻伐的时候，孙晟、韩熙载等人则主张坚持李昇的既定国策，保境安民，等待有利时机出师中原，“长安千门万户是公家百姓，五陵联络是公家坟墓，舍此将欲何之？”“倘不能拓定中土、王有京洛，终不足言也。”<sup>[7] (P5027)</sup>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采取何种军事与外交策略上，尚属于政策分歧。但随着宋党之人势力的急剧膨胀，对孙晟等人的排斥愈演愈烈，两党的争斗越来越陷入争权夺利、排斥异己的混乱状态之中，南唐的实力受到巨大的损耗，南唐政权的衰败成为历史的必然。

南唐朋党之争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混战当出现在伐闽之役失败后。保大二年（944）十二月，时任枢密使的查文徽趁闽内乱，兴兵伐闽，拉开了拓边的序幕。次年八月，唐军攻克建州，执闽主王延政归金陵，南唐取得了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从元宗到宋党之人无不得意洋洋，冯延巳更是有恃无恐地批评起烈祖李昇的既定国策，“保大中，查文徽、冯延鲁、陈觉等争为讨

闽之役，冯延巳因侍宴，为嫚言曰：‘先帝齷齪无大略，每曰戢兵自喜。边垒偶杀一二百人，则必斋咨动色，竟日不怡。此殆田舍翁所为，不足以集大事也。今陛下暴师数万，流血于野，而俳优燕乐，不辍于前，真天下英雄主也。’元宗颇领其语。”<sup>[7] (P5012)</sup>此刻的李璟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以至忘记先前身为孝子时谨守的德行，任由大臣在自己面前谩骂死去的父亲，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把握能力，也就给了宋齐丘等人以可乘之机，再次卷土重来。陈觉首先还朝，然后与李景遂合谋，召还宋齐丘，拜为太傅兼中书令，而冯延巳也出任宰相。宋齐丘、陈觉、冯延巳、冯延鲁、查文徽等人把持高位，结党营私，野心勃勃地继续推行他们的拓边计划，而孙晟、韩熙载等人则完全处于下风，只有招架之力，南唐的局势越来越朝着无法控制的方向发展。

建州之役以后，福州李弘义拥兵自守。陈觉自称可以不费一兵一卒，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李弘义投降。宋齐丘也企图为自己的私党树立功名，于是推荐陈觉为宣喻使，往招李弘义。不料，李弘义拒不受命，陈觉于是恼羞成怒，擅自发汀、建、抚、信等州兵马围攻福州。魏岑此时为漳泉安抚使，唯恐陈觉专利，也擅自发兵参战。元宗大怒，然冯延巳等人以“兵集行，不可止”<sup>[1] (P5271)</sup>为借口，又派冯延鲁等益兵会之。宋党之徒几乎包办了大军的各个要职：“冯延鲁为南面监军使，魏岑为东面监军使，陈觉为诸军监军使”，<sup>[1] (P5271)</sup>实际上，李璟此刻已失去了对局势的掌控，处于无可奈何的境地。陈觉等人为了争功，各自为战，无从相应，最终大败而归，“死者万计，亡失金帛戈甲之类不可胜数”，<sup>[2] (P5537)</sup>李璟闻讯，下令将陈觉、冯延鲁斩于军中，宋齐丘、冯延巳为救陈觉、延鲁，上表自咎，而御史中丞江文蔚，知制诰徐铉、史馆修撰韩熙载等人则同时发动，对宋齐丘等人展开直接攻击，想借机清除宋党势力，朝堂之上一片混乱，双方最终两败俱伤。由于宋齐丘进谗，韩熙载、江文蔚、徐铉等相继被贬，不过，冯延巳不久也被罢相，魏岑被贬为太子洗马，陈觉流蕲州，冯延鲁流舒州，两党的主要人物大多出朝，南唐

的政局发生巨大的动荡，而南唐国力也因此次伐闽战役的惨败而大为折损。正如史温在《钓矶立谈》中所指出的：“叟初闻江南老人言：熙载素恶于二冯，又与陈觉故不相知，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其言不无过也。及见后主归命，国家湮覆，求其倾圮之渐，乃兆于讨闽之役。然则虽断二子之首，盖不足以赎责。……由是以考之，韩之至言，当自为体国而发。”<sup>[7] (5013)</sup>党争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实力的衰微。

由于宋齐丘等人盘根错节的内在关系，他们的专权地位不是几封奏疏就可以轻易撼动的。不久魏岑就官复原职，而宋齐丘、冯延巳、陈觉、查文徽等人也陆续重掌权柄，宋党又重新把持了朝政，并继续推行他们的武力拓边计划。保大八年（950年），查文徽出兵进攻福州，不料却中埋伏，大败被俘，士卒死者万人。“南唐遭此惨败，从此再没有能力在东南用兵。”<sup>[8] (P176)</sup>保大九年（951年），南唐又乘楚内乱，发兵灭了楚。南唐虽然扩大了版图，实现了出兵的目的，但也随之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早在南唐发兵楚国之前，楚国实际上已陷入军阀混战的局势中，因此虽然马氏宗族被迁往金陵，长沙被南唐军队掌控着，但各地的楚国旧将仍然拥有掎据的实力。尤其是朗州刘言，他处处与南唐为敌，拒不投降，而且颇得楚地民心，对南唐驻军的威胁极大。其次，南唐军队驻守楚地需要大批给养，一时也难以解决。正是看到这种形势，李璟萌生了退兵的想法，陆游《南唐书》卷十四《冯延巳传》云：“元宗亦知用兵之难，谓延巳与孙忌曰：‘湖湘之役，楚人求息肩，吾之出师，不得已耳。今若授刘言旄节，使和其民，吾亦得休养衡湘之民，国其庶几乎？’忌即欲奉行，延巳方以克楚为功，乃曰：‘本朝出偏师平一国，宇县震动。今一旦三分弃其二，伤威毁重，非所以示天下。且诸将行奏功矣。’持不下。又不欲缘军兴取资于国，以损其功，遣使如长沙调兵赋，苛征暴敛，重失民心，（刘）言遂取长沙，尽据故楚地，周人亦伺衅而动。”<sup>[2] (P5550)</sup>这段记载明确地告诉我们，灭楚之战的最终失败与冯延巳等人的急功近利，为保

一己之私，不顾国家大局的作法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次用兵的失败，再次造成南唐国力的衰弱，经济状况不断恶化，渐渐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处境。

保大十三年（955年）十一月，周世宗柴荣下诏南征，此时的南唐已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处境极为危险。但就在此刻，宋党之徒仍不忘排斥异己，争夺权利。李德明自周归唐，对李璟盛称周世宗之英武，劝李璟尽割江北之地求和，这也确实是周世宗的本意，但因言语过于直率，惹怒了李璟，再加上宋齐丘、陈觉等人一再声称“割地无益”，又诱使与李德明一起归国的王崇质作伪证，攻击李德明“卖国以图利”，李德明最后被腰斩。<sup>[1] (P5383)</sup> 朱元英勇善战，克复淮南故地，战功卓著。然而因其向来与陈觉不和，陈觉便屡次上表，声称朱元“本学术纵横，不可信，不宜付以兵柄”，<sup>[3] (P3740)</sup> 在陈觉施加压力之下，元帅李景达只能剥夺了朱元的兵权，朱元悲愤不已，本欲自尽，后在门客宋洎的劝说下，率部卒降周。李德明之死与朱元的反戈，便是宋齐丘党人竭力排斥异己的例证。不仅如此，宋齐丘等人还处心积虑地想夺取国家的最高权力，再次上演赤裸裸的谋篡一幕，企图逼迫李璟禅位。《资治通鉴》卷二九四载：“会司天奏：‘天文有变，人主宜避位禳灾。’唐主乃曰：‘祸难方殷，吾欲释去万机，栖心冲寂，谁可以托国者？’征古曰：‘宋公，造国手也，陛下如厌万机，何不举国授之！’觉曰：‘陛下深居禁中，国事皆委宋公，先行后闻，臣等时入侍，谈释、老而已。’”<sup>[5] (P928)</sup> 手段方法与保大二年的隔绝中外事件如出一辙，可见宋齐丘等人时刻未忘其争权夺利的巨大野心。而这一事件也最终触怒了元宗李璟，使他下定决心要清洗朋党。他先将李景遂改封为晋王，加拜天策上将军、江南西道兵马元帅，洪州大都督、太尉、尚书令，以李征古为洪州节度副使一起赶到了洪州，而陈觉从后周出使回来以后，也被罢了近职。南唐中兴元年（958年）“十一月己亥，暴宋齐丘、陈觉、李征古罪，放齐丘归九华山，觉安置饶州，征古削官爵；觉、征古寻皆赐死。”<sup>[3] (P3644)</sup> “显德六年春正月，宋齐丘幽死”。<sup>[3] (P3645)</sup> 再过

一年，即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冯延巳病卒，而查文徽早在福州被俘放还时就已身中巨毒，病废于家，在宋齐丘死的同一年也毒发身亡。南唐党争至此终告结束。

旷日持久的党争使南唐国力由强变衰，到后主李煜之时，只能靠纳贡称臣勉强维持生计。在这场党争中两党实力对比始终无法平衡。宋齐丘等人一直占据着显要地位，他们有目的地主动地结党，为了一己之私利，排斥异己，侵损时政、兴兵拓边、劳民伤财，威胁到皇权与社稷的安危，正如马令所言“小人阿附以消君子”。为了反对宋党人物对国家和社稷的危害，孙晟、江文蔚、常梦锡、萧俨、韩熙载等人义正严辞的以予以了抨击，虽然他们在斗争中一直处于劣势，无法改变南唐的政治走向，但他们的言行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参照对比性。

Degree papers are in the "[Xiamen University Electronic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Database](#)". Full texts are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If your library is a 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log on <http://etd.calis.edu.cn/> and submit requests online, or consult the interlibrary loan department in your library.
2. For users of non-CALIS member libraries, please mail to [etd@xmu.edu.cn](mailto:etd@xmu.edu.cn) for delivery details.

厦门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库